
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

李吉荪

发生在 1937 年 12 月间的南京保卫战历来被视为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半个世纪以来,中外战史,两岸文章,提法相同,未闻异议。然“明知其不可为”的内涵究竟如何,值得作探索。南京战役的形成与淞沪“八·一四”陆海空军全面出击这一战略行为,有着直接关连,而淞沪出击又受抗日总战略所制约。故而必须将南京战役置于当年抗战总的战略背景中加以研究。

对日作战采持久战略,“拖”的战术

早在 1922 年,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观察国际形势,即判定日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,他并预策御敌方略。他在《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》一文中说:

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,即是事事与之相反,彼利速战,我持之以久,使之疲弊;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,我侪则置之第二线,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。¹

吴相湘还曾借用一段趣闻描述蒋百里的抗日作战的构思,特引录以助史兴:

民国十二年五月,方震旋与湖南吊孝代表龚浩北上,火车经过徐州时,方震忽然对龚浩说:“将来对日作战,津浦、京汉两铁路线必然被敌军占领。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,即洛阳、襄阳、衡阳。”可见方震时

¹ 蒋百里:《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》,载《蒋百里抗战论文集》下辑,广东中山图书馆藏,版权页残,第 73 页。

时念念不忘国防方针,而日本是假想敌是方震多年的认识。¹

蒋百里已预见中日必大战,抗战的根据地应设在三阳。决战将在平汉、粤汉铁路以西。蒋继承古典兵法,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必然采用“速战速决”的作战方针,我则应事事与之相反,进行“彼第一,我第二”的“持久战”,以空间换取时间,相机予以打击。战力预置华东,引敌由东向西,轴向攻防。

蒋百里的对日作战战术主张归纳为一个“拖”字。1937年夏,蒋百里会晤其老友钱均甫时说:

感谢我们的祖先,中国有地大、人众两个优越条件。不打则已,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,拖到东西战场合流,我们转弱为强,把敌人拖垮而已。²

指挥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是具体贯彻了蒋百里的“事事与之相反”、“持久战”、“拖的哲学”等方针、策略,策划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主要人物。

唐生智“一二八”以后曾任军事参议院院长、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。在抗日战备实施过程中,军委会秘密设置的执行部,其职能之一是总揽国防工事。唐生智将京沪杭由东往西分成四道防线。此方案唐先与蒋百里详细研究后,呈蒋介石核定。唐记述为:

以上海、杭州湾为第一线;昆山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一带为第二线;江阴、镇江为第三线;南京、京杭公路为第四线。同时各战线部队应预先有准备,假如上海、杭州湾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,即第一线上海、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西、皖南一带整理补充,并在那里准备阵地,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,以作长期抗日,拖死日本人的准备。当时执行部按照我的意见构成各线工事的。”

此乃蒋百里“退却机动”的具体运用。蒋以为:

¹ 吴相湘:《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蒋方震》,载《民国人物列传》,台湾传记文学社1986年版,第347页。

² 陶菊隐:《蒋百里先生传》,中华书局1948年版,第182页。

³ 唐生智:《1931年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》,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5辑,中华书局1961年版,第43页。

这种有计划的退却,务必利用地形的障碍而抵抗,此行为,在德国教令内称为“退却机动”。¹

这个预筑工事、先部署远后方,在浙西、皖南准备新阵地的计划,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方向明确。

1935年秋,苏浙三道国防工事竣工后,唐生智制定秋季大演习计划,担任大演习参谋长。此战前唯一使用两万人的大演习,正是按照蒋百里的“事事与之相反”的唯一制胜的法则,避开北方平原作战之不利,选定南方水田池沼,我军先作适应,预想敌军由东而来、由海上来的演习。蒋百里在《机动兵团之组织》中有所提示:

大机动性部队宜于北方平原地,不能使用于南方地及水田地。为使人马习惯预想战场之地形、天候,其平时训练地点,最好在预想战场邻近地点选定之。²

1935年12月6日,唐生智在大演习总监蒋介石讲话后,即作演习讲评,阐述了选择此演习地点的原因:

演习地形足以代表大部国境之地形,其特性为稻田地,横亘平形之河川障碍,山坡高峻,能通过车辆兼有相当坚固桥梁之道路甚少。”

唐设想占有机械化部队优势的日军,很难通过“不满公尺之稻田堤埂”,以及水塘、河流(缺少坚固而足宽的小桥)。我军可充分利用此类地形对敌作战,先作适应,亦事事与之相反,方能转化其优势为劣势。³

重兵置淞沪,轴向攻防

从档案资料中查证出,蒋百里是参与了1937年抗日初期战斗序列的安排并参与制定早期作战计划。他是主张将重兵预置淞沪,

¹ 蒋百里:《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》,载《蒋百里抗战论文集》下辑,第146页。

² 蒋百里:《机动兵团之组织》,载《蒋百里抗战论文集》下辑,第172页。

³ 李吉荪:《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》,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出版,第150—152页。

⁴ 李吉荪:《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》,第253—257页。

轴向攻防,将日军由东往西拖,这一战略行动的设计者之一。

在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会议汇报记录》中,记有民国26年7月21日下午9时举行第11次会议,会议由何应钦、唐生智主持,有熊式辉、刘光、谭道平等人出席。记录:

(三)作战计划之研究。¹ 蒋百里先生之意见(呈委座函之原文)。²

军委会所拟战斗序列已奉委座核定并改正。» 尚有细部须加检讨……遵委座修正各点,参照蒋百里意见重加检讨与修正。¹

以上所提作战计划,即8月7日提交国防会议讨论后,8月20日颁布的《大本营训令(令字第一号)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》等件。² 其所提战斗序列,则是7月中旬由刘光起草的战斗序列。”

这几个经过蒋百里提有意见的文件,明确规定应以“持久战”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,酌定攻守计划,以完成其任务。对一、二、三战区具体要求可概括为:

第一战区是“近迫当面之敌,实行柔性之攻击,以吸引敌人之主力”,“俾我第二、第三战区之作战,得以从容展布”佯攻也。

第二战区是固守称之为“进出之轴心”“生命线”的通道,即训令中所指“如南口、赤城、沽源之线”,使其始终为国军保有,则平津方面之敌受到牵制而不敢冒险南下。

在研究作战计划时,第三战区尚未与日军交战,但战略目的明确,措辞坚决,训令归纳为:“迅速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,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,扫荡扑灭,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对。”参照7月中旬留下的战斗序列草稿,主力集中于第三方面军(苏浙方面),方面军司令长官、战区司令长官,先是内定唐生智,后委任冯玉祥,辖张治中、张发奎、刘建绪,谷正伦等四个集团军和海空炮兵之精华,实为当年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的集中使用。从中亦可见蒋百

¹ 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会议汇报记录》,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。

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3—21页。

» 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会议汇报记录》,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。

里、唐生智早已在拟定、讨论战斗序列时,将重兵列于淞沪出击,且限定第一线兵团在7月底到达。

上述几条,均可以提示,有蒋百里参加,由唐生智主持,按照“持久战”的战略目的,在抗战初期所制定的“作战计划”和“战斗序列”,已勾画出淞沪出击,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作战蓝图。

南京非战之地,古往今来,未曾有背靠大江,面向苏南平原,以守势作战而能成功之战例。何况现代战争,南京必然处于立体包围之中。兵法称之为“绝地”、“死地”。故尔在1937年11月5日前,中日双方均无计划拟组织南京战役。

“八·一四”以后,日军犯兵家所忌,多次增兵上海,自至淞沪,寻求决战,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,妄图歼我主力,早日“结束中国事变”。我则为化解北方平原作战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均不利的因素,转劣势为优势,避免中央军北上之疲,集重兵于淞沪,造就以逸待劳,后发制人,引敌由东向西,轴向攻防的形势。只因战局在运动中突变,从华北战场和日本本土抽调来的日军第六师团和国崎旅团等10余万人组成第十集团军,乘我军换防之际,从杭州湾登陆大迂回,战局突变,军情危急。如何应对此大失误,需要以变应变。

统帅部立即决定,继续引敌由东向西,轴向攻防。主力仍向浙西、皖南转移,准备新阵地以迎敌。但此偷袭迂回之敌与从华北抽来之敌第六师团在白茆口登陆,形成对上海的合围。几十万中国军队如何撤出,又只能随战斗发展而变。蒋纬国在主编抗日战争历史巨著《抗日御侮》一书时,在第八章中采用了“惊军事委员会,必有预定之指导腹案”,点出主题,伏下一笔:

在淞沪会战时,对敏感战区之指导为“集中主力于华东方面,攻击淞沪之敌”,如攻击不成功应采取何种行动,当时并无指示,惊军事委员会,必有预定之指导腹稿。如何时改为守势,何时转为逐次抵抗等种种行动方案。惟此项方案之实施,应视尔后登陆之敌兵力究有若干,虽可加以研制,仍不能过早作主观的确定,必基于“持久战略,以空间换取时间,诱敌主力于该方面”之构想,于战况发展到适当时机,而将腹案发

布,争取次一步行动。试观第三战区之“围攻计划”、“守势作战计划”、“逐次抵抗作战计划”等,均系依赖军事委员会之指导而拟订,显见军事委员会对此早有指导腹案(备用计划)。¹

从事后看,中国统帅部预先安排南京防守,贯彻了由东向西拖、轴向攻防的战略方针。

南京战役,掩护退却

南京战役的形成,既受“持久战”总战略方针所制约,又是由淞沪围攻之战情运动而直接促成。故尔往西拖大方向不能变,为争取时间,掩护主力西撤浙西、皖南,明知南京非战之地,也只得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组织南京战役,故尔对外宣传是“死守南京”,摆开决战架势。而蒋介石在11月28日对高层宣讲则是“南京战略,盼能固守两周以上”。²唐生智则对蒋承诺:“临危不乱,临难不苟,没有你的命令,我决不撤退。”³三者似乎矛盾,实则异曲同工。谭道平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一书,对南京战役的形成,确定过程及其战略目的等作有论说。笔者认为谭书行文谨慎,甚近史实。

谭道平,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科长。他官职不高,但自从何应钦7月11日组织“卢沟桥事变后统帅部汇报会”以后,历时两月,场场会议,谭均出席,记录本上常最后列名。他亲历抗日战争战略、淞沪出击与南京之战。其所著书于1946年5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核准刊行。该书说:

南京卫戍战争,为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史之著名战役,牺牲重大,战斗惨烈,旷古之所无有,中外之所震惊。而于战略、政略,成就尤钜。事实真相,经过始末,以时日已久,亦渐趋烟没。⁴

¹ 蒋纬国主编:《抗日御侮》(5),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,第290页。

² 郭廷以: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第3册,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,第73页。

³ 唐生智:《1931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》,前引书,第47页。

⁴ 谭道平著: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序,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版。

谭书详细述说了唐生智与蒋介石商定组织南京战役的时间、用意与心情。参证其他史料,笔者以为此记载较准确,合乎研究作战之情理。

(1937年11月)八日晚,遄回南京……九日晚上,我去晋见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将军,把整理的视察报告呈出……唐生智肃然地说道:“……战争形势已经起了变化,我们业经决定放弃上海,往后,战争是降临我们门口,南京是我们的首都,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奉送给敌人,保卫的责任,现在毫无迟疑的,要我们来担负……我向大家说明,我们不能辞卸这一个责任!保卫首都!”

在散会以后,才知道唐将军当时(两处重点为笔者所加)已向委员长报告过,愿意接受守卫首都的责任。可是,我们也得了解,唐将军并非不知道南京是不可守,只是南京是我们的首都,我们不可随便放弃,他得到了委员长的允诺后,所以用着断然的坚决态度来坚定我们的心理,使我们树立起守城的信心。¹

谭道平是亲历者,了解抗日初期战略部署,直接写出了南京战役的政略和战略目的,道出其意义:

南京的守城战是中外人士观瞻所在,富有政略的意义。在战略上看来,也可以吸引追击的敌人向南京前进,使从上海撤下来的五、六十个师,至少也可以减轻一些压迫,得到转进喘息的时间。²

同时,我们要知道上海战争退下来时,我们尚有百万大军,等待重行编配,而敌人却正欲以闪电的姿态来跟踪追击,以消灭我们的作战主力,所以,我们备战首都的决心与行动,却吸住敌人四个师团以上的雄猛力量。换句话说:南京卫戍战的另一伟大意义,是在掩护我上海大军得以安然地向浙皖地区退却,而自身却不得不忍受战争的一切痛楚。”

谭道平也和蒋百里及南京战役组织者和亲历者唐生智、郭岐等一样,在早年就留下了对战役肯定的战评:

我们在南京卫戍战争中得以遵照正确的战略路线发展,于是就造

¹ 谭道平: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,第45页。

² 谭道平: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,第47页。

» 谭道平: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,第47页。

就了敌人的不幸。他们第一个判断错误,便是以为上海战后的决定性战争,便是南京,而在南京的决定性战争中,中国必然地屈膝求降,订盟城下。他们迷恋于战争的可以迅速结束,胜负可以立刻决定。然而,事实却粉碎了他们的幻梦,一部分兵力被消耗了,数万雄师被牵制着,他们不能速战速决,也不能速和速结。等到南京攻下,他们又动摇于希特勒的劝告与及德使陶德曼的奔波,而按兵不动。这样,使我们得以安然于第二线的布置,以及武汉三镇保卫战的能有充分准备。从此,他们的泥足,是更深地陷入了下去,以至今日的无条件投降。¹

至于南京战役组织与指挥者唐生智是如何评述的呢?唐说:“对于上海、南京战事的计划,我同他(蒋百里)谈过,他提了些意见。”“南京我明知不可守,这是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。”“我认为守南京主要的目的还是争取一些时间,使才撤下来的部队得以休整和准备,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虑。”²

由上述可知,南京非战之地;南京战役是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南京战役在11月5日以前,中日双方均未列入组织战役的计划。南京战役是受“持久战”总战略所制约,它是为了争取时间,掩护从上海撤下来的军队转移整补,和下一步作战的布置。

(作者单位:广州星海音乐学院)

¹ 谭道平:《南京卫戍战史话》,第117页。

² 唐生智:前引书,第43页。